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应设有效退出机制

■郭英剑

经过多年试点，我国的博士生招生制度已然发生巨大变化。“双一流”高校基本都从“考试制”变为“申请—考核制”，其他高校也都在转型之中。未来博士生招生全部改为“申请—考核制”指日可待。

对于一种制度的转变，支持与反对声音共存实属正常。但对旧制度遗留的老问题和新制度可能产生的问题，要有足够判断，并拿出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方能使新制度发挥真正作用。

我以为，在从“考试制”到“申请—考核制”的转变过程中，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同时需要出台相应措施，以补新制度落地时可能产生的漏洞。

> 我们要针对因各种原因而无法顺利毕业者，除了规定他们可以按照硕士毕业外，还要想办法给出更多退出通道，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如此方能让“申请—考核制”落地生根。

“申请—考核制”并非“申请—审核制”

首先需要明确，当下由“考试制”转变而来的“申请—考核制”，与国外的“申请—审核制”是不同的。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大都采用的是“申请—审核制”，即申请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之后就可坐等录取通知了。

从学校方面来说，通过审核这些材料，基本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读博，以及是否适合到本校求学，但一切都依靠申请人个人陈述，自然有被忽悠乃至被骗的可能。因此，国外高校很注重推荐信。一封重量级学者的重磅推荐信，基本可以决定申请者的求学命运。

总体上说，国外目前最流行的方式还是依靠近乎“盲审”的方式录取博士生。

而我们目前的录取方式是结合传统的“考试制”与国外的“审核制”，形成了介乎中间道路的“申请—考核制”。申请者向报考学校所提交的材料与国外无异。学校在审核材料的基础上，选出符合条件者并允许其进入复试。复试分笔试与面试，笔试着重测试专业基础；面试则重点考查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学术潜力等。近年来，有些高校取消了专业笔试，但加大了面试权重。最后，高校根据上述综合成绩给出排名，并依照成绩的先后顺序做出录取决定。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偏听、偏信考生的弊端，加入各种考试，可以摸清学生的基本水平；另一方面，这种改革与过去的考试制并无实质区别。从录取高校在人力、物力上的投入来看，也并未减轻各方工作量。

新制度削弱了导师主导权

在对“申请—考核制”的批评中，有声音认为导师的自主裁量权过大，近八成导师承认招生过程中拥有自主权。为此，有考生担忧这可能影响招生公平。

我不知道这一数据是怎么来的，这些导师所承认的“自主权”到底在哪里？如果此调查为实，考生的担忧自然成立，也令人有理由怀疑目前的“申请—考核制”有重大缺陷。

但从设计者角度看，“申请—考核制”的一个精髓就是从制度上削弱导师的主导权，而现实也似乎达到了这一目的。

随着“考试制”向“申请—考核制”的转变，我所了解的高校大都从“导师制”转为了“导师组制”，即由3~5人的博士生导师组成一个专业方向的录取与指导小组，既负责录取工作，也负责考生入校后的培养。

这与过去的“导师制”——由导师挑选考生、出题、改卷，以导师为主面试、最终确定录取人员，导师负责培养全过程——有很大不同。在“导师组制”下，导师组的所有人审核考生材料，共同为考生打分；复试时，如果有专业笔试，大多抽取试题库的题目，导师不一定参与判卷。专业面试时，3~5人的复试专家各打各的分，最终按照平均成绩排定名次。在这个过程中，导师只是导师组中的一员。

正因为这种设计，才导致导师主导权被严重削弱。应该说，这有利于录取中的公平、公正与公开。

当然，如果要从2~3位甚至更多考生中选择1~2位入选者，导师依然有主导权。在众多考生成绩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由导师做出最终选择，只要不违反录取程序，这应该属于导师本应具备的主导权。

但必须说明，从制度设计层面看，哪位导师要想利用自己的所谓“主导权”，舍弃排名靠前的考生，录取排名靠后的考生，除非作弊，否则根本不可能，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审核条件应一视同仁

如前所述，“申请—考核制”的第一关是审核材料。一般来说，只要材料符合要求，申请者大都能通过这一关，进入复试阶段。

依据我的个人经验以及观察，报考博士生的群体主要分三类。一是在职高校教师，其大多是本科或硕士毕业多年，希望通过读博提高自身学历水平，也有的是基于高校的特殊要求；二是应届本科生或研究生；三是本硕毕业后想回到高校任教，或想通过读博来实现个人理想。

然而，一个现实矛盾是，一方面，高校都在鼓励教师读博，这一点地方高校表现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当前各高校都提高了对于硕博连读的录取比例，包括要求更多地从应届硕士毕业生中录取博士生。

众所周知，当下导师的博士生录取名额极其有限，平均每年能录取1位就不错了。如果限定录取直博生或应届毕业生，高校在职教师被录取的可能性自然会大大降低，甚至失去可能性。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制度正在朝着直博生与应届毕业生有利的方向发展。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审核材料时，相应规定和考查内容却对高校教师更有利。因为高校教师获得的科研课题、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著作等，恰是绝大部分直博生和应届毕业生所缺乏的。因此，从审核材料上看，直博生与应届毕业生是很难与高校教师相抗衡的，这就形成了矛盾。

我以为，制度设计应该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名额有限，就将优秀的高校教师拒之门外，也不能因为考核制度设计问题，让我们无法发现有潜力的优秀应届毕业生。

学者应认真对待自己的推荐信

在“申请—考核制”中，有一个必不可少但又往往被忽略的环节，那就是专家推荐信。

专家推荐信都是由考生自己寻找专家，写好后，再由专家寄往考生所申报学校，或直接由考生连同相关材料一并上交。据我了解，除少数学者外，大部分学者对于写推荐信一事，都抱持爱护、支持与宽容心态。因此，推荐信中也是好话连篇、添油加醋，对于一些问题则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

近年来，一些高校为增加推荐信的可信度，借鉴国外经验，针对考生的智力水准、思维能力、学术水平、合作精神等给出一个范围，要求专家给出考生所处位置。比如，若是位居前2%，考生就属于卓越人才，若在前5%，则是非常优秀等。对此划分，学者最常见的推荐就是，每一项中，考生都位居前2%或前5%。这就让人觉得很假。

目前，专家学者推荐信的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泛泛而谈，针对性不强，甚至其推荐信可以适用于所有优秀考生；其次是千篇一律，所说评语看似都是好话，但对审核人了解学生帮助不大；最后是草率了事，很多推荐信都不是专家本人所写，有的甚至是学生直接代笔，专家签字、为此背书了事。

事实上，看推荐信也是对专家学者的一种考验。对于他们而言，即便把推荐者吹得天花乱坠，但审核者结合申请者的学习成绩、考生经历等，大体也能判断出专家言辞的真伪。

国外审核材料时，由于极其看重推荐信的分量，所以对其有一定的识别度或辨识度。比如，大体上能分辨出哪些可能是学者因限于某些原因而不得不写的推荐信。甚至在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学者的无奈，进而对申请者做出正确判断。越是对那些大牌专家的推荐信，高校越是格外慎重。

推荐信虽推荐的是他人，但更是学者自己的信誉函，他们要对个人学术声誉负责。

不能忽略有人读不下去的情况

博士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层次，也是难度最大、困难最多的人才培养层级。为此，博士生招生既要严格程序，也要眼中有人，认真对待考生的所有材料。从考生的面试表现中，既要观察其是否有学术潜力、学术热情，也要考查其是否有通过科研为社会与世界做出贡献的理念与实践。

人才培养中，无人不渴望培养出优秀人才，但各种人才培养也都可能失败。我们渴望成功，但也要意识到，博士生人才培养相较于本科生与硕士生而言，成功率可能是最低的。

目前，博士生培养制度的设计思路是，要求进入博士生项目的所有人不仅要按时毕业，还要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学术要求。在绝大多数高校，博士生除完成毕业论文外，还有在高级别刊物的学术发表任务。相应的，近年来很多高校将博士生的学习与研究年限从过去的三年延长到了四年。

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制度都是为让学生按时毕业设计的。比如，虽然规定博士生可在6~8年内毕业，但超过4年就属延迟毕业，对延迟毕业生较多的导师予以停招处理。

此外，忽略了可能有人读不下去的情况。比如，有学生读博后无法完成学术所规定的任务，甚至因此出现精神问题。再比如，鉴于现行录取程序，导师对学生并不充分了解，导致导师在学生读博后，才发现其可能并不适宜做学问。但现实是，除了继续指导甚至逼着学生做研究外，导师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只要博士生不能按时毕业，大部分责任都需导师承担。若因为各种原因，学生简单地退学了事，对导师会有影响，但最终受害的是学生。因此，这又反过来促使导师产生“只要学生顺利毕业就万事大吉”的心态，进一步降低博士生培养水平。

当下流行的“申请—考核制”会加大导师对学生的陌生度，学生在读博后发现自己不适宜或不愿意从事学术的比例也会加大。为此，我们要针对因各种原因而无法顺利毕业者，除了规定他们可以按照硕士毕业外，还要想办法给出更多退出通道，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如此方能让“申请—考核制”落地生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我国高等外语教育体系的改革与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1AYY016〉阶段性成果）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应“点亮”哪些技能

■高虹

当下，教育的时代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

在历史上，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电力、信息等单一技术为特征，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体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群体技术涌现和融合的特点。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一批创新型大学应运而生，大学的使命也从教育、科研拓展到引领国家和区域的创新体系。

针对这种变化，全球都在行动。比如，美国国家工程院针对本科生提出了“大挑战学者计划”，把跨文化、跨学科、创新融入本科教育，让学生能够应对全球重大挑战。麻省理工学院则实施了“新工程教育转型计划”，对工程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

我国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发展时期，着力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新”在什么地方？“新”在突破了狭窄的专业概念、多学科交融、问题导向、产教融合、创新驱动。这些转变对教育，尤其是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人才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的新要求。

工程研究生教育面临三大转型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并不相同——后者承载了通识教育的使命，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色；前者则是为学生职业生涯做好准备的专业教育，需要与产业和行业更好地对接。

目前，我国的工程研究生教育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其中，学术学位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聚焦学科前沿和技术突破，注重“从0到1”的源头创新。专业学位教育则面向产业进步和行业需求，是“从1到N”的应用创新。

当前，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实现三个转型。

一是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以往，高校通常按学科划分，教师发展和研究生教育都强调学科的归属。但专业学位教育一定要对接产业，紧密契合产业发展需求。

二是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融合。产业需求不是按学科划分的，真实问题也不是按学科界定的，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解决问题需要跨学科协同。

三是从适应社会需求转向主动引领发展。高校不再被动服务社会，而是前瞻性地看中国的未来发展以及世界的未来走向，主动超前布局，支撑引领。

四大职业胜任力未得到足够重视

从学生培养角度来说，从前我们强调数理基础和专业技能，今后还要特别加强“三创”（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全球胜任力、工程实践能力以及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等四方面能力。在以往的培养中，这些重要的职业胜任力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在“三创”能力培养方面，目前高校开展相关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创新始于创意，创业可以是创新的结果。从新概念的萌发孕育到设计研发，再到形成样品，“三创”教育给予学生创新全过程的体验，让他们突破思维定式，习得创新方法和练就企业家精神。创业过程往往历经磨难甚至失败，需要保持百折不挠的意志力。

设计思维对于工程创新尤其重要，需要左脑分析能力和右脑创新能力的统合。美国斯坦福大学机械系的教授们在咖啡馆萌生了创设D.School的想法，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学院，而是一个类似创客空间的地方，为培养未来的创新者成为突破式的思想者和实践者提供空间和平台，支持与工业界紧密合作，用设计思维激励跨学科团队，攻克难题并通过原型找到解决方案。而设计思维、用户视角、产品意识及创新精神都是当前工程人才培养比较缺乏的元素。

在全球胜任力培养方面。经济和产业发展已离不开全球化的大场景，高校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力，为他们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做好准备。上世纪末，美国教育学会发布的《全球胜任力是21世纪之关键》报告指出，全球胜任力必须成为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核心使命的组成部分。

全球胜任力可以从认知、人际、个人三个维度的六个核心素养进行理解，即学生要了解世界知识和关注全球议题；掌握外语并了解不同文化；保持开放态度和尊重文化差异；能与多元文化背景的团队成员交流沟通、和谐共事；深刻理解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在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方面，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往往来自导师的研究课题。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深入产业，到真实世界寻找真实问题。真实问题通常没有清晰的界定，更不是课堂里的习题，难以靠单一的学科知识解决。学生要深入企业一线体验用户需求，理解鉴别问题，通过创意设计，利用理论方法提供解决方案，并通过“原型”制作，最终交付“产品”。

这样的全链条训练对于学生非常重要。这是一种基于项目的“做中学”，需要多学科甚至跨文化的团队协同，以及反复沟通和迭代修正，在实践中创新。这正是学生未来要面对的真实工作场景。

在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培养方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各行各业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恪守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是对他们的基本职业要求。

从教育角度看，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具有专业能力，还应像专家一样思考问题、做出决策判断。面对生态环境、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问题时，要非常明确哪些是不该做的。价值塑造不是一句空话，科学精神、人文关怀、道德规范、法律意识、行为准则都要融合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大卫·惠斯勒在清华大学讲学时曾谈到，平均不到1秒钟就有一架客机从世界某地起飞，作为航空发动机专家，他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这些旅客的人身安全完全依赖于发动机的质量，这让我印象深刻。我们的学生将会成为各行业专家，他们要常怀对非专业大众的怜悯之心、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以及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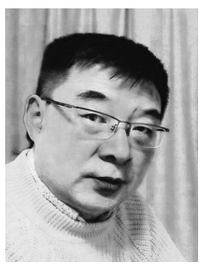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工程教育需要一次转型。这不仅需要高校内部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评价标准的深刻变革，也需要高校—企业—政府合作机制的创新，以及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衔接。从工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工程专业学位教育肩负着重大使命。

培养产业需要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加强产教融合是必由之路。高校需要仔细聆听产业的声音，快速响应行业需求，跨学科、成建制、灵活多样地设置专业学位教育项目，与产业紧密合作，共同设计项目，共同开发课程，共同指导学生，共同合作研发，切实为培养推动产业进步、引领产业发展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协同努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执行院长，本报记者温才妃整理）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大学教师的『焦虑』情绪从何而来

近日，一则深圳大学学生辅导员的招聘广告引发广泛关注。围观、叹息、议论者多是在校博士生或者未来的博士生，起因是报名条件中要求“28岁以下的博士”。也就是说，只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环环相扣、一路直升的博士毕业生才刚刚够“年龄资格”，如稍有耽搁，即便有“常青藤”盟校、原“985工程”高校之类的名校博士学位，也闯不过“资格线”。

博士生网友的反应多是出于对前途的担心。这种真正进入大学工作前产生的焦虑，充其量只是社会焦虑的一种。想入职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虽然身处大学校园，却未必能体会到转换角色后的心理和情绪。因此，他们的焦虑只能算是一种大学之外的“外部焦虑”。

当下，大学普遍实行的新入职教师“非升即走”政策，因为是结果立判的，且在政策执行上出现过多种问题，最容易引发议论，争论也最多。甚至有人以为，这是大学内部焦虑情绪的典型代表或引起焦虑的动因，但它其实只是大学里诸多“焦虑”中最表象化的一种而已。

三四十年前，大学里还很流行“适度的焦虑”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法则。然而，如今要在教学上对学生施加“适度的焦虑”，其效果要么引起直接的反弹，要么让学生产生更多焦虑。因为多年的鼓励式教育已经让多数学生失去了对一般性焦虑的承受力，而所谓多元的评价方式，并没有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反而让“适度的焦虑”中的“度”游移得太无章法、不可控制。

无法在教学上施以“适度的焦虑”，就容易产生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无力感。它不仅意味着教师的权威大打折扣，还会消解教师的教学热情。面对自己的讲课被学生以睡觉或玩手机的方式所轻视，教师当然可以当“鸵鸟”，但任何有责任感和自尊心的教师都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过去我们看到讲完课的老师是疲倦的，但眼中充满着欣慰；现在同样是疲倦，流露的却可能是十足的无奈。

科研上的焦虑是以另外一种情形呈现的。由于科研管理的日趋科层化，让原本相对单纯的研究成果发表和学术价值评价变得不再单纯。期刊级别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唯级别论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以往按照期刊级别评价和奖励，直接造成了所有教师追求论文数量而不得的焦虑。

然而，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方面，量化管理日渐僵化，只认数字的结果是既不重视内容，也不再（或不想）鉴定内容；另一方面，在意识到此问题后，高校相关部门不是探索新路，而往往会依照习惯设计出新的量化指标。

多年来，在SCI期刊或者《细胞》《自然》《科学》三大“顶刊”上发表论文，已成为检验理工科专业教师科研水平的主要标准。特别是近两年，文科专业也不甘寂寞，纷纷以“与国际接轨”名义，加大文科专业外文期刊论文的奖励力度。于是，在外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立即变得价值连城，哪怕此类论文没有进入JCR高影响力区级，内容也不过是介绍性质，所获奖励也要高出中文核心期刊上中文论文的5至10倍。这也让原来的数量追赶又加上了对新政策的适应和再追赶。这时候的焦虑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而是复合式，是一个又一个没有秩序地堆叠在一起的。

形式重于内容还只是引发焦虑的一个因素。按照这种量化管理模式的要求，形式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它已经被赋予了“学科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因为诸如学科评估、专业认证、大学排行等与学术评价相关的内容都看重形式，所以即便是心知肚明，也要加以维护。依此逻辑，“形式”即便是一个空无一物的纸盒，也要假装它很充实，或者只盯着它的外表，学会欣赏没有美感的包装。

因此，一旦从业者的“境界不够”或适应不及时，很可能就会产生更深的焦虑。

从网友针对深圳大学招聘的议论中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倾向，即有心进入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似乎都将待遇放在首要位置。由此可见，在一些博士生心目中，大学已不再是具有独特性的教育净土，而只是诸多社会或经济机构之一；教师也不再是单纯的“灵魂工程师”，而只是若干职业或就业岗位中的一个。

从本质上说，就业就是为了生存。博士毕业生将入职大学下放到生存层面，还只是一种外部观念的投射。反观大学自身，至少在管理方式上，也在推动和适应类似的下放或下行趋势。

只不过，这种来自校内外的生存诉求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基础上的，且又与“好生活”的向往方向一致，因而让“生存”式价值观被包装得合情合理。

然而，生存焦虑是人人都会有的焦虑，如果笼统地将“生存”作为目标，就等于抹杀了职业的差异和基于职业特点的期待，以及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因此，唯有超越“生存”观，教育和文化机构才可能名副其实。

应该看到，理想的大学既不是生存竞争之所，也不是生活优渥而无所事事者的避风港。